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〇期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12d)

【人物访谈】	陆平晚年谈周培源和聂元梓	奚学瑶
【史海钩沉】	邓朴方的致残与聂元梓的罪责	舒 声
【痛定思痛】	为了不再重演悲剧	郭道晖
【研究评论】	历史，在红墙后面变得模糊	张 鸣
【热点讨论】	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	更的的
【各抒己见】	也说道歉	冯敬兰
【网文选载】	关于“红卫兵道歉”的讨论	螺杆网·季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访谈】

陆平晚年谈周培源和聂元梓

• 奚学瑶 •

1964年秋季，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此时，陆平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他的地位显赫、高高在上，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只能是“高山仰止”而已。起初，他的高大威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教”初期，他一度挨批。偶尔路上见他，似乎精神低迷，背后亦有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文革”中，他成了“千夫所指”、“万恶不赦”的“罪人”，备受磨难。然而，他顽强地熬过了漫长的寒冬。

1999年冬季，因撰写《周培源传》之需，我寄宿于北太平庄四号院，得知陆校长亦在院内居住。出于工作需要，亦对于一个饱经磨难而得以幸存的师长的怀念，便萌发了登门采访的念想。给他打了电话，略作自我介绍，说明了意图，他答应了我的请求。翌日，我进入他简朴的家中，见到了他与老伴。我执弟子礼，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对这个曾经深受“文革”磨难的长者表示自己深深的同情。岁月沧桑，销磨了当年的威武之气，老病缠身，蔼然一个慈祥

的长者；陆校长已经白发苍然，垂垂老矣！他身衰体弱，语声细弱缓慢，底气不足，但记忆依然十分清晰，脑筋反应很是敏捷。他说，这些年来，他对作家、记者概不接待，自己也不写传记和回忆录，言外之意，对我是破例了。我以为，这大概是他出于对周培源校长尊重的缘故——他们之间，虽然曾有齟齬，历史如麻，错综复杂，然而，当周校长去世时，他亦前往周家吊唁，一度因政治和工作歧见引发的个人恩怨，终于消融在人性的温情之中。正因如此，他与我的两次谈话，便弥足珍贵，反映了他晚年的一些思考，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表达了他对周培源和聂元梓的不同评价，流露了迥异的感情色彩。现将记录公之于众，以供大家参考，并示纪念。

第一次：1999年11月26日上午的谈话。

问：请您谈一谈对周培源的看法。

答：我是到北大后认识的周培源，以前不认识。我于1957年10月到北大，当时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陪我去看他，介绍了他的科研情况。他研究湍流，国际上有一定名望，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59年北京市委布置北京市各高校吸收一批老专家入党，由市委大学部提名，经市委同意，北大有周培源、高小霞、侯仁之等四人，后来，侯仁之没能加入。校常委会指定张群玉等2人作为周培源的入党介绍人，动员他入党，写申请书。党支部讨论了两次，未通过，原因是副校长工作没抓紧。校党委派人做支部工作，后来支部过半数通过。

问：请谈一谈您对聂元梓的看法。

答：聂元梓进北大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其哥聂真原是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我是青工部副部长，我们关系不错。北大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地下党的，素质不错，我们想再从外边调几个老同志进来。五八年后学校有很大发展，需要充实系一级领导。我和聂真此时都是北京市高校党委委员，他介绍了“我妹妹”，“她身体不好，到北京工作，治病方便一些”。聂元梓当时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我想聂真此人不错，他介绍的人也错不了。我就派北大组织部长到哈尔滨市委商洽。哈尔滨市委同意调出，但说不能提拔，只能做系一级领导。

聂元梓可能是1962年调到北大的，先到经济系任副系主任，后又到哲学系做总支书记。她对北大地下党干部的看法有错误，后来她被选入北大党委。“社教”中，她挑了头，邓拓批评我说：“你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社教”运动中，张磐石打着中央工作组旗号，来北大调查，主要找年轻干部，找了二十多人都行，就一人对北大的问题提得好，此人就是聂元梓。说了什么问题？张磐石不讲。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中宣部庞达揭出来聂元梓与张磐石的谈话：说你们来晚了，现在北大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现在只能彻底改组才能解决。张磐石十分信任她，后来张磐石派阮铭到哲学系蹲点，从全国各高校调了许多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北大搞“社教”试点，把哲学系当作突破点。

问：听说“社教”中周培源曾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告您的状，您见过这封信吗？

答：我没见过，但听说过。

问：您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吗？

答：“社教”中周培源是跟着聂元梓一起造反的。周培源给周总理信说我是“三乱分子”，不，没有“分子”，是“三乱”。

问：哪“三乱”？

答：“乱说”、“乱干”……还有一“乱”不记得了。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市委副书记万里找周培源谈话，没谈出结果。万里又让我主动找周

培源，又没谈成。周培源根本不让我说话，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让我喝水，一张嘴就给顶了回来，气势汹汹，谈了5分钟就谈不下去了……

（此时，陆校长老伴入室，为其健康考虑，要求中止谈话，于是，第一次采访到此结束。）

第二次：1999年12月10日下午的谈话

问：有人说周培源是著名科学家，但政治上却是“红领巾”，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似乎，他唯恐此种看法有损于周培源的形象，赶紧向我解释。）

答：不，他不是政治上的“红领巾”，他是政治上的左派，几十年给党做了许多工作，在国际上参加了许多学术交流，在统一战线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有名物理学家，对北大有很大影响，但在科研和带研究生工作上，群众认为他做得不够。在党的领导下，他在九三学社团结了一些进步的人。

问：您能否谈谈有关批判江隆基和邹鲁风的问题？

答：江隆基在临走时（笔者：指他调离北大，去兰州大学），在学校党委常委会上，对他在北大这一段思想有什么缺点作个总结，没人批他，只是提了一些问题。

对邹鲁风没有大规模批评，只在内部——党委常委会上批判。他是两校调查组（笔者：邹鲁风于1959年，曾是“人大、北大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组长）负责人，压力大。

问：有人在《同舟共进》杂志刊登文章，说您与邹鲁风谈话后，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致使他自杀。

答：我只是与他谈了一次话，没有施加压力。说邹鲁风之死与我有关，这是造反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人说，北大反右派打击过宽是我弄的，也是诬蔑不实之词。党中央发了文件，给予平反，有人又提出这个问题，给造反派翻案。

我到北大时右派快划完了，划了500多，我在临湖轩进行复查，说：“都一个团了！”有的班右派占优势，超过百分之五十了。（后来扩大右派名额）请示高校党委，可划可不划是否不划，后来卡了一百零几个没划，最后可能不到800（笔者：《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为716人。）之后，文革中说我包庇右派。

问：您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到北大的，整个形势越来越“左”，这不等于把您搁在火炉上烤吗？

答：……

（或许这句话问得有些唐突，他陷入沉思，迟迟没有回答，我赶紧转移了话题。）

问：请谈一谈您个人的经历好吗？

答：我于1934年入北大教育系，副系则是英国文学系。学了三年，第四年是论文年，没做论文就下乡了。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北平学联的工作，是代表北大去的。我原是东北地下党的，1933年在吉林市加入，后被通缉跑出来，老家是长春。

（不知怎么，又提起了1959年反右倾。）

我当时曾说彭德怀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文革”中因为这个迟迟未解放，追查我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采访结束后，我请求为他照一张相，并与他合影，他欣然答应了。我用我的“傻瓜”，为他与其老伴留了一张影，他的老伴亦为我们照了一张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

## 【史海钩沉】

### 邓朴方的致残与聂元梓的罪责

• 舒 声 •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受伤致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谁应该对此负责？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

在聂元梓被判刑的？（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中写到：“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七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籍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中、韩琴英、姜鹤鹤、俞藏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他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八月九日、十四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最近在网上有一篇署名余玮的文章“40年前的真相：邓朴方为何要在北大自杀”，其中写到——

邓朴方的言论被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而聂元梓对迫害邓朴方并导致他摔伤致残是不认帐的。在聂元梓口授回忆录中写到——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情况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

好呢，省得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没有说过要把邓朴方关起来，没有要害他，我不愿意叫学生之间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他不知道，你强迫他他也说不出。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2010年07月28日韩三洲的博文“九十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中说——

聂元梓辩解说：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刻骨铭心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们姑且把认为聂元梓迫害了邓朴方并导致残疾的一方称为“控方”，为聂元梓开脱认为她没有责任的一方称为“辩方”。综合以上两方的说法，笔者认为要判断聂元梓在这个问题上有无责任，必须弄清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 一、聂元梓为什么要迫害邓朴方？
- 二、邓朴方是什么时候摔伤的？
- 三、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之间的关系。

笔者当时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63级的学生，作为北大文革的全程亲历者和邓朴方的系友，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邓朴方是被新北大公社抓起来关押的，这是控辩双方一致承认的不争事实。据笔者所知，实施绑架任务的是新北大公社技术物理系的成员，因为邓朴方是这个系1962级的学生。抓起来后关押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抓人的时间应该在1968年4月，这时北大双方武斗已经开始，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为了打击和搞垮对立方组织，派了很多人在北京甚至外地去绑架对立方组织的骨干和同情者，邓朴方的名字也被列入名单。从聂元梓当时的地位和心理来看，她有迫害邓朴方的动机，因为她认为北大社教后期，邓小平“包庇”了陆平，聂对邓一直怀恨在心，文化革命中，聂率先贴出“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大字报，趁乱抓住邓小平的子女，可以满足她的报复心理；另外邓朴方对聂元梓一直很反感，观点是同情支持她的对立方组织的，趁武斗之机把邓朴方抓起来，一方面可以审问出有关邓小平的秘密材料，作为重型炮弹去向“中央文革”请功，另一方面也可以嫁祸于对立面组织，把他们的后台说成是邓小平，一举两得，可谓一举两得。除了动机以外，她也有实施绑架和关押审讯的条件，她手下有一帮凶狠残暴的打手，也有关人的地方，他们能把樊立勤双腿钉上铁钉，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而绑架邓朴方这样重要的人物，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来说是一件大事，聂元梓不可能

不知道，下面的人没有她的指示也不敢私自进行。

二、邓朴方是什么时间摔伤的？有两种说法，一是1968年5月，他被绑架关押一个月以后，在聂的自传中也是这样说的。二是1968年8月，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之后，是聂看到邓榕的书出版后改的口（其实邓榕在书中是说8月末知道消息的，并没有说邓朴方是什么时间摔伤的）。那么邓朴方到底是什么时间受伤的？笔者和许多技术物理系的同学都记得是在北大武斗中，工宣队进校之前。而各种网站（包括新华网、人民网）上关于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的简介上说的很明确：

邓朴方，男，汉族，1944年4月生，四川广安人，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1962—1968年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1968年5月受迫害致残

1968—1975年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5—1984年 总参管理局服务处干部

1984—1984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1984—1985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副部长级）、副理事长

1985—1988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1988—1991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党组书记，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1991—2003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1999.12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2001.11明确为正部长级）

2003—2004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2004—2006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2006—2008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2008—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个简历是2008年3月14日邓朴方当选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新华社公布的，应当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这个简历中明确指出：邓朴方是在1968年5月受迫害致残的，那时在北大掌权的正是聂元梓，迫害邓朴方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聂元梓及其直接操纵的新北大公社某些人。所以聂元梓企图从时间上来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三、凡是经历过北大文革的人都知道，从1966年8月初工作组撤离到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校，校文革是北大的权力机构，聂元梓一直担任校文革主任。原来校文革中还有一些不同意见者，1967年后都被她赶了出去或自己退出，校文革就完全被聂和她的追随者掌控。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虽然名义上它还有自己的“勤务员”，实际上完全受聂的控制，听命于聂和校文革，成为聂元梓的工具。1968年3月末开始北大的武斗，就是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指挥下，由新北大公社部分人员发动和实施的。因此，在聂元梓掌权期间，不管是校文革名义还是以新北大公社名义干的坏事，聂元梓都应负完全责任。聂元梓在自传中说新北大公社是群众组织，干的事情她不知道，也不负责任，完全是掩耳盗铃，自

欺欺人。邓朴方是被新北大公社部分人员绑架、关押的，看管、审讯和殴打他的，也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员，他的摔伤致残，完全是由于被绑架、关押、逼供、虐待而造成的恶果，作为北大当时的掌权者和新北大公社行动的操纵者，聂元梓怎么能够逃脱自己的罪责呢？

迫害邓朴方导致他摔伤致残只是聂元梓在文革中犯下种种罪行中的一件。聂在这个问题上做翻案文章的目的是企图由此打开缺口，为自己的罪行全面翻案。当前，社会上也有人企图利用聂元梓为文革翻案，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人们应当有足够的警惕。

文化革命结束已经40余年了，经历过北大文革的教师、学生，如今都已成为花甲以上的老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当年的知情人用笔记录下文革的真实情况，告诉下一代，也揭穿那些企图为自己罪行翻案者的谎言。

2010年11月28日初稿 12月4日修改

~~~~~

【痛定思痛】

为了不再重演悲剧

• 郭道晖 •

《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刊载一篇《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揭示1967年该县发生的群众性地、大规模地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4519人，并扩及其他10县，造成全区被杀和被逼自杀共9323人的惨剧，其中包括四类分子的子女和未成年人近5千人！当时当地的领导干部声称杀人“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杀人凶手事后还扬言：“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何其毒也！读之令人骨颤。

文革中类似的大规模杀人事件，有北京的大兴县对四类分子的大屠杀，五天内杀死325人，包括80岁老人和出生才38天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广西柳州放水淹杀防空洞里对立派别的群众，有的地方甚至炒吃人的心肝；内蒙古杀所谓“内人党”；各地武斗中的杀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3千万人被斗，50多万人死亡。辽宁司法机关虐杀张志新烈士还狠毒地割断其咽喉（据传当地犯人临刑被割咽喉的前后达30多起）。《往事微痕》第63期所载《血迹斑斑忆此生》、《难以忘却的噩梦》、《朱宝铨惨死亚比克》、《假案的炮制与破灭》、红河州劳教所的“人间地狱”，及其他回忆文章所记述的那些残酷迫害和虐杀同胞的史实，着实骇人听闻！

凡此种种打人、杀人甚至吃人的暴行，是中国当代史中最残暴惨烈的一页。其总根子固然在始作俑的暴君，但那些策动和指挥杀人的领导人和直接行凶的刽子手，在具体执行“最高指示”时不是打折扣，而是更加码，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警世箴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类人的罪恶是不能全推到暴君一人的。可以说，文革期间及以前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除了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坑害了无知又不讲伦理道义的“红卫兵”而外，还把一批社会上的人渣的兽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了。

造成这种后果也有其政治文化根源，其中祸害最深的是对人权的无知和蔑视，突出表现在对人的生命权和人格权的践踏。

1. 生命权

革命领袖为了革命的“崇高目的”，对一般人的生命权是不大看重的。除了战争中必然要有大量牺牲外，内部左倾错误路线和各派山头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曾导致杀人盈野。早在苏区，大搞所谓反AB团斗争，就杀了几万无辜干部和战士。以致造成被“自家人”杀害的同志比被国民党杀害的还多。

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对数以万计的有正义感的革命青年进行拘捕审查和治罪下狱，《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

解放后的镇反运动杀了71万人，最高领袖多次下达镇反命令和指标，说：“应当放手杀几批”，“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抗美援朝我方总共牺牲了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4246人。被美军抓去的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返回大陆，却几乎全部被打成“投敌叛徒”，有的被开除出党，有的逮捕法办，很多人折磨致死。

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波匈事件”说：镇反运动“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他听到斯大林杀了100万党员干部，却说：“一百万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多嘛！”（参见《百年潮》1999年第3期）后来又说，导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就是因为起初没有杀反革命。“我们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破除迷信的讲话时，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似有异议。毛泽东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转引自成林：《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镇压反革命》，人民网《大地》2002年第十五期）

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会议上说：“中国准备牺牲三亿人，支援世界革命。”195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又说过，历史上经常几千万几千万人死，能死掉一半人呢。后来他又说，不怕打核战争，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惊世骇俗放言，把外国同志吓得目瞪口呆。

反胡风、反右、反右倾运动中被迫害而自杀、因劳改而折磨致死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无法统计。

至于疯狂的大跃进造成人为的大饥荒，活活饿死达3755万8千多老百姓，相当于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出764万多人。（参见辛子凌：《千秋功罪—红太阳的殒落》）历史上从无饥馑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1250万人。（参见原四川省委书记廖伯康《回忆录》）

革命领袖认为死人的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解放后本应是处于和平建设时期，仍鼓劲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仅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人家被抄家。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上亿人受迫害。据清华大学统计，该校文革期中被“四人帮”一伙非法审查、批斗、关押、株连有案可查者就达上千人。一个学校就有一千个反革命和准反革命，不亦多乎？但在当时并不耸人听闻。如鲁迅在批判国民党“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白色恐怖暴行时所指出的：“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而见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

这里也不妨援引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博客上为纪念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遇难的人们所说的一段话：“对民族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让我们好好想想吧，数百万人因恐怖手段而丧生，而他们的罪名均是谎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这样的说辞，那些众多的牺牲品是为了某种国家的最高目的。我坚信，无论国家需要什么样式的发展，无论他的成就如何，狂妄的自尊自大不能以人的痛苦和伤亡为代价。任何东西都不能高于人的生命价值。因此，镇压是有罪的。”（见2009年10月30日斯大林大清洗遇难者纪念日，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博客上的留言）

2. 人格权

中国古代士人（即知识分子）是最注重节气、骨气，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士可杀不可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这就是注重人格尊严。而最高领袖则十分鄙视知识分子，蔑视知识分子的人格权，说他们吃共产党的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反右到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对象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被污称为“臭老九”，对他们采取各种非人道的手段，诸如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跪玻璃，所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极尽侮辱人格之能事。

一些视人格尊严的价值高于生命价值的当代文人学士，无法忍受对其人格权的侵犯，而被迫自杀者，历次运动中都大有其人。特别是文革中更其悲惨。如老舍的投湖，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的双双自尽。他们虽是自杀，却是一种曲线的维权斗争——维护人格的尊严，义不受辱，申张了天地的正气！

死者已矣，生者何为。与这些被杀、自杀的人们不同，不少人以刚强的意志受尽折磨、渡过苦难后，在庆幸劫后余生之际，又重新站立起来，继续为人民争生存、争自由民主而不懈奋斗。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拒绝遗忘，突破禁忌，将千古奇祸的真相和教训昭告后人，也警示当年那些奉旨整人甚至助纣为虐者知所收敛，改过自新。现今出版的山寨刊物《往事微痕》、《黑五类回忆》等就担当了这种使命。

在各次整人运动中，不少人在运动中跟风整人，执行恶法恶令，以求自保，伤害了一些人，包括自己老战友、老同学和亲人，事后深自忏悔，登门道歉。他们当时一念之差，没有尽起码的道德义务，做了些落井下石的事，以致备受良心谴责，遗憾终身。像《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赵遐秋在其《跟风整人的懊悔》一文中诚挚的自责那样。或像2009年第2期《炎黄春秋》一篇文章所反映的，一位老干部临终还念念不忘这个毕生欠下的良心债，死不瞑目。应当说，他们毕竟还是良知未泯的好人，这是千古悲剧。

也有很多随波逐流、因无知而“无畏”的“红卫兵”，参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干了残害打杀干部、师长的恶行。他们多是受“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的思想理论和“最高指示”的蛊惑，以阶级论抹杀人性论，以“划清敌我”取代维护人伦，以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对“阶级敌人”愈狠，“无产阶级感情”就愈深。也有不少人还怀着怕被视为“立场不稳”或“丧失立场”的恐惧，担心稍一不慎，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发现‘行恶’能嫁祸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见《炎黄春秋》2010第10期王练利文《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而全不顾维护起码的人性、人权的道德底线。虽然他们也是受愚弄利用，后来还被抛弃，驱赶到农村，也受尽了艰难困苦，但不能以此否认和原谅他们作为整体在文革初期的恶行，特别是不应忘记清理这个历史教训，并向曾经受过他们残害的人诚挚地道歉，以抚慰被害人的心灵创伤，也减轻自己良心的负债。需要指出的是，迄今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而现今他们大都是正当50—60岁的壮年，许多人还是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骨干，如果不认真反思和清理文革影响，就难免不会在其工作中有意无意地保留某些文革的思维方式和作法，贻害世人。君不见现今有的地方还在大张旗鼓地开万人大会，将上访公民捆绑游街，挂黑牌示众。有的地方派员跨省夜半闯入民家捕人查抄。这无异于文革遗风的重演。

至于有些成心不良、别有图谋的人，在历次运动中积极卷入，充当打手，助纣为虐。有些人甚至是借纣为虐，即借运动的大旗，为个人私利或某一宗派的利益，排除异己，乘机打击报复，甚至有本书所揭发的，为夺人妻而做出灭绝天良的暴行。这些人至今仍不见有所反思和忏悔，更从不道歉。造成这种局面，主要基于他们本是一些社会渣子或政坛痞子，又得到执政者当时无法无天的鼓励纵容和事后对此的宽容包庇。虽然文革后也搞了一阵“清理三种人”的专项斗争，却并不彻底。过去一贯的政策是所谓“保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不严加惩处，导致他们成为历次整人运动的职业打手。近年还把反右和文革等历史真相列为禁区，不让揭露和总结教训，以致年轻人还不知有此悲惨的历史；当年整人乃至杀人者，有的还继续横行乡里或称霸文苑政坛。

对比一下二战后德国当局处理纳粹分子的态度，即使他们隐姓埋名，逃到天涯海角，即使他们已是七、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也要将他们追捕回国，绳之以法。当然，中国有“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我们也不是以暴易暴的报复主义者，对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历史罪犯可以从宽处理，但不能听之任之。我们不能只要求外国“以史为鉴”，而对自己本国的痛史却有意淡忘。

□ 原载《往事微痕》63期《滇友五七之声》专集前言

~~~~~

#### 【研究评论】

历史，在红墙后面变得模糊

• 张 鸣 •

冷战时期，据说是有铁幕的，铁幕这边的情形，那边的人，包括历史学家，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凭借零星的资料，闷头胡乱猜，最高的高手，也只能猜个大概。那时候香港有个大学服务中心，专为西方的大学学者研究中国提供服务，由于离大陆近，收集资料相对方便，而且还可以就近访谈大陆那边逃过来的偷渡客，一时间，竟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据点，凡是上了点年纪，有点知名度研究中国的学者，没有不在这里访问过的。可怜的人们，在篱笆的边上，探头探脑，最后也没探出个名堂。

就历史研究而言，铁幕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稀罕。政治的中心，红墙

之内，里面的生活是禁区，消息也被保密，一直都有铁幕挡着。虽然有的朝代有宫门抄和邸报，不时地公布一点大路货的奏折和诏书，但政治操作的内幕，外面的人，还真就难以了解。好些野史作者，如果不是知情者，说三道四，其实多半也是在瞎猜。即使朝代换了，宫廷档案，也只有少数官方修史者可以利用，对于民间有同好者而言，铁幕依然。

在今天，历史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治史者对人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有了更多的兴致，似乎就西方史学主流而言，政治史，已经不再时髦。中国人当然也跟着走，一窝蜂去在边角旮旯找题目。可是，中国跟西方不同，人家不热政治史，是因为政治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的政治史，尤其是近代的政治史，还是荒芜一片。加上民主化没有完成，人们对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的兴趣很浓，因此，史家的转向，跟着西方一起转向，实在没有太多的道理。

可是，没有道理，人家也转了。所以，好些政治史的探秘，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探秘，变成了文学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的专利。道理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要供给者。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的地方还是半遮半掩，但门毕竟是开了。探秘，也有了条件。核心的档案虽然还没有解密，但昔日中共的亲密盟友前苏联的档案却解密了，不仅解密，有段时间还可以成批地往外卖。我们这边的档案，虽然不解密，但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渠道，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这些官方研究机构服务的个人，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资料整理，陆续透露出来一些，比如几位中共的领袖人物，毛、刘、周、朱、邓诸位的建国以来的文稿，年谱，以及传记这样的“文献”研究，里面都有大量新披露的档案材料。

回忆录的写作，也披露很多消息。当然，过去的大人物，写回忆录都有专门的班子，都属于官方写作。但同样是这样的官方写作，有的人的回忆录写的四平八稳，官话充斥，有的人的回忆录却能反映一些真实的内容，一些经历重大历史关头之际的真情实感，自然，也透露出不少真实的信息。比如徐向前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都相当有价值。更有意思的是，回忆录不是大人物的专利，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小人物，也要写回忆录。他们每每口无遮拦，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官方出版不了，就自己找地方印，分送友好。虽然良莠不齐，但却百花齐放，其中有些身世不凡的小人物，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往往能透露出特别重要的信息。比如，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就很大胆，很值得一读。一个在延安时期在中央机关做厨子的老红军，官阶很低，但他的回忆录，却告诉我们关于延安整风时期好些别致的内幕。

当然，还有一些红墙内的消息，是一些记者，作家和爱好者从亲历者或者某些大人物的家人亲友那里挖出来的。这些消息的量非常之大，的确透露了好些内幕，但往往互相矛盾，各说各话，掺了大量的水，里面还有写作者自己的想象，甚至假造，有的人几乎全篇作假，还冒充是内部访谈。一个很知名的红墙写作的作家，接二连三被曝他的所谓作品，没有一个是访谈得来的，全是自己闭门造车的产物。然而，这样的红墙内幕，在香港的书店，随处可见。即使发表在相对严肃一点的刊物上的此类作品，同一个事情，居然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面相。比如林彪北逃摔死，有的说周恩来听闻后放声大哭，有的则说是摆酒庆贺，我们信哪个呢？当然，在红墙的墙还足够高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写作的来源还比较靠谱，不是生编硬造的，都可以立存此照，聊备一说。

资料的源头多了，可说的故事，也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民间的红墙历史叙事如此行世的缘故。有时，仅仅一个资料来源，就足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何况，可以依赖的信息源有这样多了呢？但是，就红墙历史叙事而言，认真地多看点书，多找资料，详加类比和判断的写者并不多。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访谈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比较会讲故事，他的故事也就出来了。

红墙史说，鱼龙混杂却能够一直兴盛，源于需求旺盛。这几年，中国的历史写作兴旺，电

视台讲史热络。大家热衷红墙，是因为红墙里住的人。这些年，中国热过清史、明史，也热过民国史，其实，最该热的，也最可能热的，就是晚近的历史，尤其是红墙里面的历史。之所以没热起来，是因为太多的政治限制。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黑龙江的乡下，乡下的老百姓见着政治高压稍减，街谈巷议，都是中南海里面的事，说的有鼻子有眼，而且生龙活虎。好些段子，好些讲者，放在今天百家讲坛都只能给他们加分，提高收视率的。当然，当年的民间讲史，都是过于纯然的民间创作，跟田里耕作的百姓，想象皇帝生活一样——大树底下乘凉，西瓜吃吃，蒲扇摇摇。折腾半天，各种故事，无非是当年宫廷里忠奸斗争的翻版，有朝里的忠臣，贤相，有奸臣乱党，汉贼不两立。但奸臣乱党恰好得到皇帝的小老婆，西宫娘娘的支持。当然，皇帝好色，偏爱西宫娘娘，纵容老丈人小舅子为非作歹，也是朝廷大乱的根源。放在当时，所谓的西宫娘娘，就是江青。四人帮中的那三位，都算是小舅子。

现在这样解释历史的农民，已经不多了，但人们对红墙秘史的关切，却依然不衰。记得十来年前，曾有若干标明“红墙”，“中南海”字样的大块头的书，里面都是七拼八凑的内容，不犯禁，只猎奇，甚至有些讨好，但却卖得很好。有若干书商，甚至专门靠编这种书挣钱，居然还真的挣了不少钱。应该说，今天的红墙历史，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水平，很有些模样了，可信度也在增加，写者和读者在市场中的磨合，使得写史人的历史，也在进步。

但是，从本质上讲，关于现代史中的高层历史叙事，红墙里的事，越是关系重大的，还是雾里看花，有太多的朦胧之感。读的人大多想的是探秘和猎奇，写的人为的也是揭秘和猎奇。人们对于红墙之内这样一个神秘而又决定自己命运的地方，有着太多的好奇。这种好奇，本质上跟现在的人们对于皇帝，对于后妃，对于太监和宫女们的好奇，其实是一样的。凡是神秘而且尊贵的地方，总是能引起人们太多的好奇心。谁没有儿女，谁没有老婆，但红墙里的儿女和老婆，人家就感兴趣。不仅老婆孩子，连中南海里的一切，人们都兴致勃勃，吃喝拉撒，都算上。当然，对于最核心的政治决策，人们也不是不关心，只是关心也没有用，基本上没人说的清楚。

严格说，《凤凰周刊》组织的这组庞大的连载《红墙中南海》系列稿件，跟它的同类文章，是有点不同的。虽然说，这组稿子，还没有脱出探秘和猎奇的窠臼，好多内容，都在领袖家庭生活，中南海秘事上打转，中南海的摄影师，厨师和理发师都被纳入视野。还有现代的人们特别感兴趣的特供，也有非常厚实的一笔。不过，这组稿件，却让人感到可信，题目方方正正，行文也方方正正，无一丝类似文章中的渲染和轻佻。好多文章，都出自记者的访谈，但无论访谈对象的选择，还是访谈本身，都做得相当认真，可以看出，每次访谈，记者都做足了功课。其中的回忆录部分，也选择得比较谨慎，至少没有出现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想出“长安街政治史”这样的题目，借用长安街政治地理的变化，杂以政治风云的变迁，穿插许多编写者想表达的意思，真是用心良苦。加上有重量级的党史研究专家高华和谢春涛的加盟，使得这组文章，显得很厚重。甚至化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当代的毛泽东热的问题。让历史跟现实，在历史的叙事中，得到了某种连接。

然而，厚重和可信的红墙叙事，能说出来的新鲜事就不多。这组红墙叙事，虽然涉及的话题很多，也很刺激，但里面的基本上却都是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看过的东西，特别新鲜的刺激不多，似乎也没法多。在选材和行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嗅出编纂者的艰辛，以及编纂本身的尴尬。毕竟，在目前这个领域具有诸多限制的年代，碰这样一个话题，还想说出点内容，还要避免此类题材常犯的轻浮病，实在是太难了。好多题材不能碰，好多访谈不能用，严肃的研究者的研究，也进不来。带着镣铐跳舞，大抵，也就能跳成这个样子了。新闻记者做历史，往往带有现实的影子，新闻的影子，在凤凰周刊的这组稿子里，我们看到过于浓烈的现实关怀，也看到这种关怀的扭曲。

显然，即使是记者们很用心的红墙叙事，也改变不了当下这类历史的通病，探秘和猎奇，依旧主宰着这个领域。对严肃问题的探讨，还没开始，也许永远都开始不了，红墙叙事，只能是故事。凤凰给人们提供了一组可信但不大刺激的故事，人们还会继续追求那些不靠谱但刺激的奇闻轶事。

在资料和题材双重限制下出现的红墙历史叙事，大概也只能是故事，有的故事，刺激，但真假莫辩，有的故事靠谱，但老生常谈。无论那一种，它们的功能，只能解构，而无法重建。这样的东西看多了，固然有时能增加一点不确定的历史知识，但时间长了，却每每造成人们的历史虚无感。让人感觉真像无从知晓，言说无从信任，在这种虚无中，即使是红墙历史，也会变成搞笑的材料，变成一种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的无厘头。

虽然说，现在管理的出版当局，给了人们一点写作以往高层历史的自由，但却没有同步开放档案，人们可以写的题材，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某些历史的阴暗面，还是不能碰的禁区。这样的阴暗面，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人眼里，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历史上，实在也是太多了一点。有时人们可能会利用某些手段，迂回地涉猎一点，但还是说不清道不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高层历史，高层历史人物的开禁，在很大程度上，跟当局有意要领袖人物走下神坛有关。文革结束，造神的过程趋于破产，弥补神话的最好途径，是让原来的神走下神坛。走下神坛的神，具有人的亲切感，所犯的错误，也易于为民众所谅解。其实，今天看来，那一系列走下神坛的作品，不过是重新制造了一个人性化的神而已。

然而，神既然已经走下神坛，再给捧上另一座神坛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即使有限制地开放出来的档案资料，有限制地出版的回忆录，还是给了以往完全被封闭的人们，一种不同的信息。很不合格的红墙历史叙述，也给了人们某种思考的契机，某种探索真相的冲动。即使是红墙历史叙事，也很难被局限在当局限制的尺度之内，总有些东西出乎人的意料，总有些信息能吓人一跳。一个社会，总会有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会千方百计去探求真相。从另一个角度讲，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不可能不物质主义泛滥，而物质主义最大的精神功效，就是解构崇高，过去的神话，加上神坛，都难逃被解构的命运。“领袖也是人”，既意味着领袖的错误被原谅，也意味着领袖坠落尘埃。所有的人都是图利的，所有的崇高，都是虚伪的，过去蒙上光环的政党和领袖，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发现自己过去是被欺骗了，对付欺骗的最好策略，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历史的言说。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靠领袖、政党神话搭建起来的历史，已经不再能维持得住，因此，连累意识形态也变得苍白。可是，这些年，任何一次想要重建历史神话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甚至到后来，这种努力本身，还没发动，就自动变成了牟利的过程，比如大学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因此更增加了人们虚无感。

还好，除了故事版的历史叙事，我们的现代政治史，还有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人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读者在增加中。然而，以这几位为代表的现代史学学者，却痛感资料受限，研究受限的约束之苦。比起十年前，现代史的研究，受到的限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正经的研究受到限制，唯一剩下的，就是纯粹官方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现在也成果有限，那么，还能看到的，就只有红墙故事叙述了。

越是关切到自身的历史，对于执政者就越重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越是重要的历史，就越要加以研究，而不能搁置起来，不讨论，甚至不闻不问。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早晚得面对，年复一年地搁置起来，无非是做沙漠里的鸵鸟。重新清理自己的历史，是执政党面临的绕不过去的课题，只要这个党还想继续执政，就没法不面对现实。但愿，这个道理，在上面的有权有力者能早一点明白，到那时，凤凰周刊也许再做这样的题目，就会有更加可以期待的内容。

□ 来源：共识网—作者专栏

~~~~~  
【热点讨论】

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

• 更的的 •

问：近日《南方周末》发文，说是有几个原红卫兵向原校长道歉了，文章认为是“开了个好头”。而你为什么发问“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谁来向红卫兵道歉？”

答：道歉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谁也没有权利反对，但是也不很支持，尤其不支持这种有选择的宣扬和误导。

问：为什么？

答：因为觉得按照常识，学生如果有必要为当年在校时的集体所作所为向校长道歉，那么这不是校长的光荣和成就，校长理应赧然、汗颜或者羞愧，也必然应该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向学生道歉。

问：为什么呢？

答：很简单，就因为这些红卫兵当时是这个校长的学生。

红卫兵不是怪胎，红卫兵就是学生或者一部分学生，他们如果不比今天的学生好，起码和今天的学生一样。

不想说什么养不教、教不严等等的空话，不想说“每一个罪恶都是社会的罪恶，每一个他人的罪恶我都有份”这么抽象的概念，国人不懂这种话语。让我们抛开具体的校长或者老师来回顾一下，文革开始前的学校是怎样的政治环境。自从1957年阳谋以后，人人噤若寒蝉；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更是人人自危，生活在恐惧中。中学政治课学的“社会发展简史”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学说非常务实地渗透进了学校的教学生活。

每学年一次学生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主要是调查学生的家庭出身（即父母亲及直系亲属的工作或家庭经济来源），以此来决定这个学生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且不说当时的校长一般兼着政治课的教育，每学期还要做一到两场形势报告；就是一般的老师也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班主任老师更是每学期在学生报告单的评语里评价学生的思想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学生和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并且不断要求学生自己坚持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进步。

这种改造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要求学生和非无产阶级的家长划清界限并且展开斗争，具体的做法就是每星期的周记必须记录自己的思想改造事例，（也就是韩寒说的，说谎从作文开始。）经常或定期要向老师汇报思想。思想是看不见摸不准的东西，思想改造，实际也就是诛心，这是多么抽象的事情。只要老师认为你需要改造，那就是必须改造。于是，有的学生就开始打父母亲的小报告，并且公开宣布和剥削阶级的父母亲脱离关系，（脱离了关系以后，他们是怎么活着的？不知道。）可怜更极端的个别学生就自杀了。

这一切，如何不让所有的十几岁的学生看在眼里，怕在心头？

而校长，则很正确地用“该生不宜录取”毫不留情地决定了一个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被大学拒之门外。拒之门外以后呢，大部分就到边疆或者农场去了。

当然，“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更是成为了最简单最重要的学生守则，成为了不容怀疑的政治教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待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也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思维定势（至今仍是）。

后来成为文革演出台本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每个学生的必读教材，必须毫不动摇地对湖南农民或者“痞子”表示敬仰，必须同意、拥护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抄家、游街确实是“好得很”。

如果对这一切稍有怀疑、稍加讨论或者牙缝里有半个不字呢？那么，这就是该生思想复杂，拒绝思想改造，对现实不满，立场有问题。立场有问题的短期效应是老师和校长反复找你谈话，要你写思想汇报，帮助你改造思想、提高认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长期报应就是影响“前途”，失去了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可能，自毁了一辈子的生活。

这大体就是文革前学校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

问：那么这和文革有什么关系呢？

答：文革自北京发起时，对于《十六条》，学生、老师、校长以及工作组一样是捉摸不透的（刘少奇也蒙在鼓里呢）。以为事不关己，只要小心翼翼躲过一劫，最多只是政治课多了一些教学和考试内容。

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听说过。老师和校长根据以往亲历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社教等等运动的经验，以为又是再演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按照经验认识，对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如今也是）。但是，凡是中央号召的各个政治运动，却是一定要积极参加的，不参加就是对运动有看法、有抵触。于是一面抛出不少死老虎（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材料，一面安营扎寨埋伏、心惊肉跳地等待着谁跳出来。

很快，每个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现了。学生会写什么大字报呢？一般也就是依样画葫芦，都是炮打某某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矛头所指不是校长就是书记。一刹那，工作组、老师和校长们不要下手太快啊，简直是弹冠相庆，立即组织学生围攻，谓之抓游鱼。

煽风点火的大串联开始了（首批出来点火的北京红卫兵被各地政府抓起来或赶走的不在少数），全国的舆论工具开动了，毛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上了，北京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了。没有几天，北京的做法风靡全国，工作组撤走，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本校的执行者——校长、老师的批斗或者折磨开始了。

这就是1966年夏天开始，学生或红卫兵们的罪过。这个过程大抵在1966年冬基本结束或者基本趋于平稳，后来红卫兵们杀向社会了，因为有更大的走资派，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在等着他们去打倒。再后来呢，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了，两大派开始形成，接下来由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挑唆，大规模武斗开始了。

问：这一些能说明什么呢？

答：这就是1966年文革初期的事实。

问：这难道是学生批斗、殴打老师、校长的理由吗？

答：既然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既然是多年来老师、校长的教导，既然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既然对于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你觉得有其它更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选择吗？

换一句话说，如果反过来，毛主席、党中央说，资产阶级就在学生中，老师和校长会客气一点吗？也许不一定会拳打脚踢，但是肯定彻底毁了学生的一生。

再明确一点，如果没有文革，校长老师不还是在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折磨学生，不还是在要求学生听共产党话、跟毛主席走，不还是在灌输种种政治仇恨和暴力，不还是在用“不宜录取”摧毁一个个学生的人生吗？他们又何尝认为这是错误或者罪过呢？耄耋之年午夜梦回也会有些许自责或不安吗？

问：怎么没有其它选择呢？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红卫兵。

答：当然有其它可能，拒绝、抵制、不参与、不响应、公开反对，但是这对于一个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学生是不能承受之重。不可能人人都想到做、敢于做张志新或者遇罗克的。就是那些权倾一时，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封疆大吏、传闻曾经叱咤风云从不怕死的革命老将，尚且无一例外、服服帖帖低头认了罪。四十多年以后忽然希望学生对抗毛主席而反潮流，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吧。

是有一部分学生做了逍遥派，但是，大抵是在1967年武斗开始以后。至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串联、批斗学校里的走资派，不可能不参加。那时候大部分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形成，文革是以班级为集体参加的。如果生逢其时的学生说没有参与，除非是病假或其它罕见的特殊原因，否则就是很简单的原因：说谎。

问：那么红卫兵作为个人就没有罪过吗？

答：罪过与否，罪过大小，必须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来判定。如果在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能判定弱肉强食是罪过吗？当然，拿现在看似风平浪静时候的标准看，不讲前因后果，单纯把“学生殴打校长”这一个命题拿出来判定，肯定是罪过。但是，这种判定公正吗？

问：日军、纳粹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答：这个比拟非常荒谬！中国人没有身体力行地教导日军士兵杀人是“好得很”、并且必须“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犹太人也从来没有多年言传身教鼓励纳粹灭绝种族是“革命”、“元首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而偏偏是老师和校长多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地向学生灌输了这些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理论。而一旦他们出乎意料之外地被毛主席设定为了敌人，学生们当然遵从师训。

问：那其实老师校长也是没有办法。

答：对的。当然如此，当然如此啊。所以，才说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悲剧啊。这样，问题就回到了开始，如果学生在四十四年以后做出了道歉，那么老师或者校长，难道就能坦然接受吗？所以才发问，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谁来向红卫兵道歉？

问：也就是师生必须互相道歉？

答：道歉只是个人的选择，当然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不支持混淆因果的宣扬。何况轰轰烈烈的文革又哪里只是师生的事？文革不是并且主要不是只在校园里开展的。

问：为什么？

答：第一，因为宣扬个人的道歉会把一场荒诞至极、延续至今的全民悲剧碎片化为个人道德上的过错，把大是大非解构为小是小非，于是放纵、掩护、淡化了真正必须承担责任的罪人、文化和体制。这种仅仅关乎个人道德过错的道歉，不知不觉中把所有罪过揽过来，无疑起到了这种作用。这是真正的作恶者所希望的。

真是奇怪，如果仅仅是“打人不对”，这个道理需要四十四年才会明白过来吗？

但是，对于打人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忽然平白无故可以打人，为什么学生能够打人而且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为什么人们能够得到武器而打得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这一切却是问都没有人问一声。仿佛倒是很平常不过，无须发问的。

第二，不管怎么说，这样是不公正的。把这场革命的发生、经过以及后果让当时十几岁的孩子来承担，而当时的衮衮诸公以及数亿成人却仿佛没有存在过。谁该承担什么，就该承担什么！学生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老师该承担什么就该承担什么，校长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其它人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这才是公正！这才是全民的觉悟。公平和正义，比太阳更光辉。无论如何，学生不是文革的主导，更不是当时社会的主导。

问：文革会不会再次发生？

答：这要看如何界定文革，如果把文革的本质定义为不允许个人的自由思考、自由表达以及自由选择，被迫对强权屈服、逢迎。那么，文革早就存在，源远流长，滔滔不绝，至今也是风头强劲，文革又何尝离开过呢？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不过是其中一个桥段。

文革产生的条件依然没变，再来一次文革易如反掌，甚至一直在时起时伏地继续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能不能避免、抵御文革火山的再度爆发呢？有没有足够的常识理性

和道德勇气说“不”呢？实在看不出来。一旦强权有组织地发出号召，一旦所有的国家机器开动，一旦革命或者不革命决定你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你准备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

而且，之所以不支持甚至反对宣扬这种单向的道歉，更是由于如下原因：

因为一切都在继续，四项基本原则在继续，教育在继续，谎言在继续，恐惧在继续，文革也在继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仍旧充斥谎言，仍旧在鼓吹种种仇恨，仍旧在灌输着对强权的服从和忠诚，仍旧不允许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追究作恶多端文革的体制和元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目前的这一切，那么，难道让我们的孩子在再一次爆发后对校长、老师或者其它人再来一次道歉？

问：如今哪有什么恐惧在继续？

答：不自由必然存在恐惧。试看哪一个孩子不是从小就被告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就是恐惧！看看如今的孩子只要到了场面上，满口的爱国、满口的民族、满口的政治，哪里有一点童言？这就是恐惧！

问：文革已经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怎么可能重来呢？

答：当然，现政权对“文革”这两个字讳莫如深，装着从来没有这件事，恨不得全世界立即将它忘却。下一次爆发当然不会是同一个名称，另找一个名词有什么难的吗？不外乎是披上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外衣罢了。这几天不正在羞羞答答、欲盖弥彰地演练着吗？不是已经有爱国青年满怀仇恨误将汉服当和服而逼着人家脱衣服了吗？四十四年前的文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开始的。

问：你是红卫兵吗？你打过校长吗？

答：不认为这和思考结果的对错有必然联系。一定要回答，那是：不是，没有。

问：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答：稀里糊涂革命，稀里糊涂道歉。

※ ※ ※ ※ ※

附一： 石破天惊，有人向红卫兵道歉了！

（C & K 消息）：事经四十四年后，终于有人等来了向红卫兵迟到的道歉。

今年 88 高龄的前某中学校长及该校退休老师数人，终于向当年的几位红卫兵道歉。校长说：自从你们进入这个中学，你们就没有听到一句我内心的真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该说的真话。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什么是超越阶级的道德和做人底线，我对你们进行了三年的阶级斗争理论教育，我教导你们必须像湖南农民那样对一切敌人犹如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你们的思想汇报，总觉得你们还不是坚定的革命接班人，鼓励鞭策你们三年来不断地向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我采取了一切措施，给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学生的操行评定为乙等，把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以“不宜录取”为由关在高一级学校门外，并且把他们送到了边疆，一去二十多年，让他们在革命的风口浪尖锻炼成长。文革开始，我还把学生的出身公布，和工作组一起组织了学生斗学生。如今看来，我确实做错了很多事。

几名学生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仍然很尊敬地称呼校长为校长。学生说：说哪里话，校长你没有错，你在我们眼里永远是蜡烛、园丁、是好大一棵树。错的是我们，我们千万不应该听你的话，不应该听从文革号召，我们应该天生明白，必须坚守道德底线反潮流，哪怕牺牲小命保住校长的老命也在所不惜，我们不应该给你戴了高帽子游街，我们必须向你道歉。

一位老师泪眼婆娑说：校长啊，虽然我知道你在土改时对我爷爷拳打脚踢，1957年把我打成了右派，1966年又把我的材料在全校公布，以致我被红卫兵打得剩了半条命。但是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改造思想，为了我的进步。于是我也不断要求学生进步，要求他们不断改造思想、不断革命。1966年夏，几个学生的作文黑文章就是我公布的。第一个写大字报的那谁谁，就是我派学生监视的。现在看来，我还是觉悟不高，也做了错事。所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身为校革会主任的你把我全家老老少少下放农村，其实是对我更高的要求。由于在农村的锻炼，我现在一口气上五楼。

学生们抢着说，不对，不对，校长老师们啊，我们必须深刻道歉、甚至认罪。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没有校长、老师以及别的成年人的什么事。没有我们，哪来什么文革呢？没有我们，哪来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没有我们，你们哪里就会斗得不亦乐乎了呢？我们确实打了老师，给校长戴了高帽，虽然我们当时只有十几岁，但是一场文革的滔天罪孽必须由我们承担，其它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样才能化解什么“毛左”的死不认错，才能证明我们民族的良知，最终达成人民的和平、和解以及和谐。

师生们互诉衷肠，热情握手，两代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化解了多年来的恩恩怨怨。

这时候，校长的孙子也插话说：今天学校让我们上街游行抗议了，我还飞脚踢了一辆进口车，要不是有人拦着，我非把那开车人也痛扁一顿不可。

校长问：脚没有受伤吧？不要乱打，看清谁开车了吗？外交无小事。

孙子说：我又不是红卫兵，没事，一看就是个暴富的傻娘们。

校长、老师、学生、孙子都欣慰地笑了，他们觉得，历史教育了我们，革命自有后来人哪。

※ ※ ※ ※ ※

附二： 给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巴金先生：

我们是原XX中学的校长和几位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长眠了。

说来话长，事过44年，我们学校的几位原红卫兵学生终于向我们道歉认错了，心里本来蛮适意的。想不到有一个“更的的”网民，一定是红卫兵余孽，把您老先生搬出来，说是您写过《忏悔录》，所以伊对依老尊重，对我们就很有些不屑，有些嗤之以鼻。我们打听了一下，原来真有这件事。于是想向先生请教请教：

先生念头真是老怪呵，没有事你不好搓麻将、嘎三湖吗？您忏悔什么呢？您要忏悔也便自己忏悔罢了，出什么书呢？这一来，把我们都陷入不仁不义了，难道我们也要忏悔？老师向学生道不是，世界上哪来这种道理？

另外，听说先生曾经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我们以为这可是大大的欠妥，先生完全不懂政治啊。试想，如果文革纪念馆建了，反右纪念馆要不要建？大跃进纪念馆要不要建？清理阶级队伍纪念馆要不要建？土改、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纪念馆要不要建？解放以后，大大小小

政治运动几十次，那岂不是到处都是违章搭建？

再说，如此一来，我们这一代人战战兢兢、曲曲折折、遮遮掩掩走过来的路岂不要大白于世？想必先生您也知道我们这一辈子不容易，刀尖上讨生活，写了多少检查汇报、写了多少揭发材料、做了多少不大好意思讲出来的事情，这些小秘密难道就不能让它悄悄被人忘煞？介许多纪念馆一建，真真假假展品稀里哗啦一摆，各种证据旁证索引一贴，岂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岂不是一个大酱缸里一大堆的烂人？这怎么可以呢？这样一来，兹事体大，戏法全部拆穿。大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呢？到哪里去找这个民族的良知呢？怎么达成广大人民群众和平、和解以及和谐呢？

所以，我们认为先生此举大大的不可，希望先生这个主张再也不要提起。幸亏先生的书已没有人关注，纪念馆的事情更是杳如黄鹤，不要说有人就是不予理睬，就是我们也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反正学生已经认错道歉了，我们欣然笑纳，老怀大悦。总算这个事情有了着落，有人自愿顶了罪，就算再来三四次、七八次文革，我们管它将来如何呢？世界上的事体哪能好介认真呢？

带来几只大闸蟹和一瓶老酒，不知道先生是不是喜欢。伏惟尚飨！

□ 原载《华夏文摘》cm1011b 2010-11-12
~~~~~

【各抒己见】

也说道歉

• 冯敬兰 •

近来，南方周末关于文革中的红卫兵向老师道歉的文章很吸引人，让我也想起一些道歉的故事。1991年我从外地调回北京不久，同年从山西刚回北京的我班一同学，专门到我家看我，向我道歉，我很纳闷，她又不是干部子弟，文革中也没整过我，干嘛道歉啊？她说，文革中我揭发过你。我所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三某班一位同学，文革中很左，整过不少同学，90年代她就召集班里同学聚会，请大家吃饭，公开道歉。前几年，另一高三班级也搞过类似的道歉聚会。我校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不仅给受害校领导写了道歉信，还多次去老师家沟通，她认为光道歉不行，而是要把对方的心捂热。后来这位前校领导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向她说出1966年8月5日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暴力致卞仲耘校长不幸惨死的真相。外校道歉的事情我也听说过，譬如多年前北京101中高某班（美籍友人韩丁的女儿卡玛所在班）的红卫兵请老师同学上庐山聚会并道歉，老师也向学生道歉，因为文革前他们也用极左的手段整过学生。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缺少道歉的传统，所以这类道歉更能打动人心。我听到的每一个道歉故事都让自己受到了感动。我相信一定有许多道歉故事，只是没有登报或被媒体炒作。道歉的故事不是谁从历史深处挖掘出来的，它一直在发生，何谓“开了好头”？道歉只在应该道歉的地方出现，因为不是它演戏，何谓“公开”？“首度对外披露”？道歉不是私家秘籍，不是个人珍藏。上述庐山聚会难道不是公开？不是对外披露？道歉早就在进行着，它不是文人的作秀或电视上的鉴宝。

总之，道歉是精神的洗涤，是人性的刷新，道歉应该是生活常态的一部分。

※ ※ ※ ※ ※

附：致《南方周末》编辑部

南方周末 11 月 4 日刊登的《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作者：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朝格图，即《历史深处的来信》，载本刊 z k 1 0 1 1 d）不但严重失实而且自相矛盾。

该文前面写道：“1966 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行动，红卫兵们虐杀死者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

该文后面又让被虐杀的胡志涛起死回生：“1993 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 1966 年 8 月 5 日打了她表示道歉。”

事实是：1966 年 8 月 5 日下午，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对他们实施了暴力殴打、劳动体罚和人格侮辱，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惨遭不幸。胡志涛文革后曾任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安徽省教育工会主席，1995 年去世。刘致平于 1979 年至 1986 年担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九十年代初去世。汪玉冰文革后调往 46 中任职。梅树民老师至今健在，是学校的老领导。

作为原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看了这篇文章感到非常不解，不知两位记者根据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会自相矛盾？不知贵报的把关人是如何审稿的？为什么连如此明显的错误都看得出来？

希望贵报对该文的严重失实予以公开的更正，并向生者和读者道歉！亦请贵报就把关人的失职登报检讨。以示其诚，以警效尤。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66 届高三学生刘 进  
66 届初中学生冯敬兰

~~~~~

【网文选载】

关于“红卫兵道歉”的讨论

• 螺杆网 • 季逵 •

螺杆网：要红卫兵道歉，实质上就是要所有参与文革的民众道歉

文革伊始的老红卫兵，本来是由工作组指挥的，并不是自发的组织，它的背后是中共的革军革干爹妈，抄家破四旧毁灭中国文化，屠杀无辜平民的，就是宋要武这些老红卫兵们。应该说，老毛的“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文革的斗争矛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长期以来的官民矛盾挑动起来了，中共的高级干部们很清楚，这把火迟早会烧到自己头上，为了自保，就教唆子女们成立了血统论色彩极浓厚的红卫兵，目的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毛泽东的“中央文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引导清华北大的大学生组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制造了与老红卫兵分庭抗礼的，以平民子弟为主的新红卫兵，红卫兵分裂后，就有了造反的红卫兵与保皇的红卫兵，再后，才有了工人农民参加的造反派组织。

武斗是造反派夺权后的事情，为什么会有武斗？还是和中央文革的挑动指使有关系，因为“红色政权”三结合的干部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有很多是毛泽东黑名单上的“走资派”，还有“军内一小撮”支左，也站在了“保皇派”一边，毛泽东搞文革不单纯是为搞掉刘少奇，如果只搞掉刘少奇是没必要发动文革全国大乱的，只消发动一次宫廷政变就解决了，他主要是为了斩草除根，把刘体系的人马都清洗掉（起码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都在数难逃），怎么办？那就还和制造红卫兵分裂一样，也制造群众组织造反派的分裂，来个反夺权，这就是武斗的起因。

文革与四清运动有极大关系，老毛搞四清本来是为了整肃干部队伍，他认为三面红旗的失败是由于农村中层干部的抵制，而且农村的基层干部也都被资产阶级腐蚀了，甚至被地富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如果四清搞的成功，他可能还不至于产生文革的念头，通过四清，他发现自己被刘少奇架空了，因为刘邓为了保护自己多年培植的中层干部体系，指使工作组把针对“四不清干部”的斗争目标转向了普通干部和民众，尽管老毛又发布了后十条纠偏，四清还是搞得不了了之。文革开始也是如此，在刘邓指挥下，工作组又把针对领导的运动引向了群众。这两次政治运动，都与刘邓的“别有用心”有关，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毛泽东的别有用心，为了自己的处境，不得不搅浑水，反毛泽东其道而为之。

红卫兵，不过是毛泽东临时打造的政治工具，运动后期这个工具就没用了。怎样来安置红卫兵？按毛泽东原来的打算，是把他们当成炮灰，在与帝修反的战争中消耗掉，但是通过中苏边境小规模的实际较量，毛泽东才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就放弃了打世界大战解放全人类的野心。再就是千百万红卫兵的就业问题，文革后，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现有的工矿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消化这么多人，那么这些“解放军的后备军”就是个动乱因素，所以要妥善处理这个累赘，如何处理？毛泽东的办法是统统驱赶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又发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要红卫兵们鸟兽散，这是毛泽东文革后下的一步“很大的棋”。

经过武斗整合，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胜券在握，再也不需要大规模的打斗工具，除了打发“红卫兵小将”上山下乡，又一声令下，全国所有各企事业单位的各类派性组织，一律“倒旗”撤消解散。接下来是九大，新的权力格局亮相，军人成了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差不多是军人政权了。通过清队和追查五一六，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五大学生领袖和群众组织造反派头头们也都一律“犯了错误”。亲不亲线上分，几十年来紧跟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们结成了新贵，原来以党名义下的专政，成为领袖一个人的专政，毛泽东的朕即天下理念终于实现。文革，全过程是1966年至1968年，其实只有三年，所谓十年动乱，是邓小平按自己下台的时间定义的，是中共右派失势的十年。

今天学者们编写的文革史，有的是奉旨胡扯，掩饰真正的元凶毛泽东，有的是引章据典（两报一刊社论）美化文革，有的干脆更简单：红卫兵造反派就是义和团，没一个好东西，要忏悔要道歉，向谁道歉呢？被害者就没害过人？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一直没间断，一直是在利用群众斗群众，除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真正的无辜者有几个？要绞肉机里的肉馅互相道歉？要篓子里的螃蟹们互相道歉？象邓小平这样的铁腕屠夫，不该批斗？是不是今天也应该向他道歉？其实文革的“天下大乱”和“大民主”并不是真正的大乱，也从来没有过“大民主”，文革自始至终，都牢牢的掌控在毛泽东的权力之下，自始至终都在《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的强制约束下，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在奉旨造反奉旨武斗，都是乌合之众。可悲的是，今天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还在错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也是国内毛左势力占了风头的主要原因。

所以，要红卫兵道歉，实际上就是要所有参与文革的民众道歉，混淆了保爹保妈高干子弟老红卫兵和后来的群众造反派的差别，其实这是两个阶级两个群体，从来就是对立的，而且今

天这种对立更加明显，矛盾也更加尖锐了。中共贵族子弟老红卫兵的罪责，为什么要平民子弟的红卫兵来承担？偷牛的跑掉了，抓了拔拴牛桩子的，公平吗？纳粹的罪责要全体德国人民来承担吗？日本军阀的罪责也要全体日本人民来承担吗？所以说，有所谓的文革专家定义红卫兵是个整体，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真正的文革史，其实并不在中国官方学者的笔下，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最清楚文革。

季逵：就红卫兵道歉问题和螺杆网商榷

看螺杆网的贴：“要红卫兵道歉，实质上就是要所有参与文革的民众道歉”，有点想法，提出和螺杆网讨论。

总体来讲，螺杆的观点和他叙述事情的方式，我基本都同意。只是在一个问题上——红卫兵道歉问题，我有不同意见。

螺杆说：“今天学者们编写的文革史，有的是奉旨胡扯，掩饰真正的元凶毛泽东，有的是引章据典（两报一刊社论）美化文革，有的干脆更简单：红卫兵造反派就是义和团，没一个好东西，要忏悔要道歉，向谁道歉呢？受害者就没害过人？”

我认为，红卫兵应该道歉，向受害人道歉。为什么？一码归一码。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施害人当然应向被害人道歉。否则，什么都翻旧账，就没有完了，也就没有了是非曲直之分。比如说，张志新，乃至胡、赵，再加上现在北京的那些自由派老人，都是如此。

另外，文革中施害人主体，就是红卫兵，让他们道歉，至少还有一个主体可追究，不然，只剩下让老毛和共产党道歉了。共产党在其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有了道歉的意思，但当然不够。作为文革施暴的主体和具体毛思想的实施者的红卫兵，当然不能逃脱其究。

至于螺杆说的：“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一直没间断，一直是在利用群众斗群众，除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真正的无辜者有几个？要绞肉机里的肉馅互相道歉？”

的确如此，除了绞肉机推动手或操手需要道歉和认罪，在具体某个案例上，比如文革中，红卫兵也是老毛下的推手或操手，他们是开动绞肉机绞别人的，为何不用道歉？

具体到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哪个案子中绞肉了别人者，都需要道歉，都需要忏悔，还是那句话，冤有头债有主，哪个案子哪个运动中当了绞肉手的人，都需要忏悔，都需要道歉。

因此，我不认为，让文革中的红卫兵道歉，就一定是让“实际上就是要所有参与文革的民众道歉”。如果大家都是绞肉机中的“肉”，那末，螺杆之分析的“混淆了保爹保妈高干子弟老红卫兵和后来的群众造反派的差别，其实这是两个阶级两个群体，从来就是对立的，”就不符合其逻辑。

再者，螺杆所说的：“中共贵族子弟老红卫兵的罪责，为什么要平民子弟的红卫兵来承担？偷牛的跑掉了，抓了拔拴牛桩子的，公平吗？纳粹的罪责要全体德国人民来承担吗？日本军阀的罪责也要全体日本人民来承担吗？”其中的道理和逻辑，也是和他绞肉机理论背道而驰、起码是不兼容的。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